

戰後臺灣政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 以內政治理為中心（2014-2015）*

林果顯 **

摘要

本文以 2014 和 2015 年戰後臺灣政治史的內政治理為中心，回顧臺灣學界為主、旁及日文與英文的研究成果。在具體議題上，政權轉換時官方與臺灣社會的互動、政府內部與美國因素的介入，以及海外臺灣人的處境成為觀察重點；受惠於資料庫的建置，省議會和地方政治運作的研究增加，另外，白色恐怖的成果亦相當豐碩。日本學界關於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從日本自身的關懷出發，關切國際政治角力中的臺灣處境，媒體研究、民主化過程、地方選舉和政黨為內政治理的重要主題。英文著作的作者相對多元，議題偏重國家認同、民主化、政策形成與國防。整體而言，政府單位或研究機構所建置的資料庫與整合型計畫，推動了新的研究面向，外語的成果也可略見外國學界對戰後臺灣政治史的興趣所在。

* 本文係105年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2014-2015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之論文修改而成。承蒙與談人鄭梓教授及主持人溫振華教授愷切提點，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特致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一、前言

本文以 2014 年與 2015 年臺灣學界有關戰後臺灣政治史的內政治理研究為中心，旁及日文與英文的研究成果，就重要與熱門的研究取向，大要地整理回顧。¹臺灣學界方面，這兩年研究成果的重要主題有「政權轉換諸面向」、「地方政治運作」、「白色恐怖」等研究。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除了根據中研院臺史所編纂的文獻類目，還參考日本《史學雜誌》2015 年與 2016 年的 5 月號中，有關前一年度日本史學研究回顧中的〈臺灣〉類別，而美國學界的研究成果則以收入中研院所編的文獻類目為主。本文包含 73 篇論文，9 本專書，目的為歸納這兩年度的研究趨向，著重議題開發與史料運用，礙於篇幅，無法將所有作品包納，謹此聲明。此外，臺灣史相關的學位論文與研討會論文改寫為專書或單篇文章的情形甚多，翻譯書籍在前一年度也曾介紹，為免重複，本文亦暫不討論。

二、政權轉換諸面向

2014 年與 2015 年戰後臺灣史的一大重點在於政權轉換時期各面向的探討。中研院臺史所主題計畫「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所關切的焦點正在於政權轉換時的各種現象。黃英哲以魯迅〈藤野先生〉一文於戰後在臺日僑雜誌《新聲》的譯本為例，說明戰後在臺灣部分的日本知識人，為了適應新的中日情勢，刪節了魯迅描寫在日留學期間軍國主義的氣氛，以及魯迅對中國民眾面對時局麻木不仁的批判，當時有其他在臺日人公開表示反對。黃氏認為，面對此一文學作品的不同態度，可觀察當時在臺日人對過往歷史與未來「中日友好」的連續與斷裂問題。²王泰升關於中華民國法制「去內地化」的研究指出，中央民意代表在實質上已去內地化，但憲法增修條文、民事法、刑事法與行政法規上的矛盾，顯示在領土範圍及行政區劃與組織上，對於去內地、去一中有著「欲去還休」的態度。³

鍾淑敏以「日本臺灣協會」為中心，說明從戰前到戰後日本政商界和民間人士與臺灣有關係者成立的組織，其功能、人脈關係與相關團體的分合情形。本文指出，由殖民時期原官商所主導的「臺灣協會」並無法代表所有遣返者利益，導致遣返者的團體分裂，但在遣返者的補償要求運動告一段落後，數個臺灣相關組織終於統合於「臺灣協會」之下。另外，戰後初期日本對於原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權利保障有限，須待 1950 年代中期日本經濟逐漸復興後，才有餘力以金錢部分補償。⁴許雪姬從滿

¹ 基於分工，有關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研究，請參閱李福鐘於上述研討會所發表文章。

² 黃英哲，〈〈藤野先生〉到臺灣：論戰後初期「中日友好」的符碼〉，收入：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臺北：中研院臺史所，2014)，頁287-311。

³ 王泰升，〈中華民國法制「去內地化」的進展與侷限〉，收入：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頁339-386。

⁴ 鍾淑敏，〈戰後日本臺灣協會的重建〉，收入：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頁69-121。

洲國的官制出發，說明前往該國發展的臺籍公務人員，並略述這批人士戰後回到臺灣後的情形。對臺灣人而言，滿洲國的統治方針對臺人相對平等，待遇亦較日本內地佳，在當時的宣傳下成為一展身手的新天地。本文指出赴滿洲國的臺灣人素質整齊，擔任公職人員最多，在當地少有欺壓當地人形成黑幫的事蹟，對戰後臺灣建設亦有貢獻。⁵ 許氏另一篇在「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研討會上的文章，說明 1952 年至 1968 年存在於全國高等考試之外的臺灣省高等考試，在拔擢臺籍人才和稍微平息省籍矛盾上具有一定效果，但由於早期考用未合一的情形下，某些職缺對臺人並不容易，高考及格也可能無法及時任用。⁶ 此例也考察原先「全中國」的考試制度在中央政府來臺後如何因應調整的過程。薛化元藉由水利事業相關名錄，探討日治末期至 1950 年代中期臺灣水利組織的人事情形，特別是日治時期任職的臺灣人是否在戰後有延續工作的比例。研究發現，1948 年後行政部門支持的領導人大幅更迭，1956 年水利會實施改進前後，日治時期水利組合的菁英影響力大幅滑落。⁷

政權轉換之際，軍事接收為重要面向之一。曾令毅從戰後臺灣的空軍接收切入，說明在運輸能力與國際政治考量下，接收並非中華民國單獨進行，美國迅速接收日本航空部隊與附屬設施，並展開各種調查。同時，從接收民用的松山機場為例，發現中華民國內部又分為「軍統」與陳儀當局彼此的派系鬥爭。最後指出由於二二八事件的影響，事件後加速機場撤廢，並避免採用臺籍航空相關人才。⁸ 楊護源的研究也指出，原先臺調會擬定的〈臺灣接管計畫綱要〉對於軍事接收細節闕如，盟軍發布第一號命令後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與駐華美軍總司令部共同擬定〈臺灣省收復計畫大綱〉，負責接收的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與美軍聯絡組（American Liaison Group）定期召開中美參謀聯合會報，決定成立前進指揮所，並制訂〈臺灣省佔領計畫〉，成為軍事接收的重要基礎。這些史實說明軍事接收臺灣並未有長遠而完整的規劃，加上令出多門，使得接收作業顯得混亂。⁹ 陳鴻獻對於政工制度的研究雖與接收無關，但同樣指出美國在制度重建時的重要角色。該文梳理政工制度的重點以及來自美國希望取消的壓力。¹⁰ 從軍事層面來看，戰後臺灣的接收與國防政策，處處可見美國的身影，在檔案日趨開放下，有待更多新的研究。¹¹

戰後接收另一個重點為糧食管制體制。曾獻緯重新釐清島內糧食控制與輸出管制兩套措施，發現長官公署無法延續日治末期的「總徵收總配給」制度，致使農民

⁵ 許雪姬，〈滿洲國政府中的臺籍公務人員(1932-1945)〉，收入：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頁15-67。

⁶ 許雪姬，〈另一類臺灣人才的選拔：1952-1968年臺灣省的高等考試〉，《臺灣史研究》，22:1(2015.3)，頁113-152。

⁷ 薛化元，〈水利會組織的變化與人事變遷：臺灣地方菁英斷裂與連續的一個考察(1941-1956)〉，收入：許雪姬(主編)，《臺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嵌》，頁123-161。

⁸ 曾令毅，〈戰後初期中國空軍在臺灣的接收與派系鬥爭〉，《臺灣文獻》，66:3(2015.9)，頁5-52。

⁹ 楊護源，〈終戰後臺灣軍事佔領接收的籌備準備(1945.08.15-10.31)〉，《高雄師大學報·人文與藝術類》，37(2014.12)，頁1-16。

¹⁰ 陳鴻獻，〈1950年代初期國軍政工制度的重建〉，《國史館館刊》，42(2014.12)，頁63-87。

¹¹ 軍事以外，1949年前後政局變動時尚有針對國民黨改造所做的研究。陳曉慧，《由上而下的革命：中國國民黨改造之研究》(臺北：漢世紀數位文化，2014)。

繳糧意願低落，取消統制後，以強制手段控制糧源，又拖延償還徵購款，造成農民生計嚴重損失。糧食輸出除了走私情形不斷，政策趨向將臺灣糧食輸出至中國大陸，致使臺灣逐漸不堪負荷，這也是陳誠擔任臺灣省主席後拒絕將糧食輸出之因。¹² 上述有關接收的研究，皆對戰後初期臺灣的政軍情勢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1945年臺灣政權轉換的過程中，除了涉及多語言與多國籍的檔案，亦反映出時代夾縫中的特殊景像。何義麟從戰後「在日臺灣人」為切入點，探討臺灣的國際地位、在日臺灣人的法律地位，以及臺灣人認同。在其專書《戰後在日臺灣人的處境與認同》中先以澀谷事件為例，觀察臺灣媒體在二二八事件前如何與上海和東京連結為訊息交流圈，二二八事件後逐步壓縮接收國際新聞與言論的空間；¹³ 接著由《內外時報》觀察在日臺灣人如何利用華僑/戰勝國人民的身分，取得GHQ統治下稀少的新聞紙配額，在戰後初期日本僑界與新聞界扮演相當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因中華民國政府介入日本華僑媒體，標榜反共的《內外時報》成為1950年代唯一進口的日文報紙，反共戰場延伸至日本僑界。¹⁴ 何氏從在日留學生報紙及僑報，觀察戰後臺灣留日學生左傾的過程，並發現二二八事件的衝擊並未使這些海外臺灣人投向臺獨運動，轉而支持新中國的比例相當高，補足海外臺灣人政治史的空白。¹⁵ 沿此路徑，考察在日臺灣人關於二二八事件論述的演變，探討海外臺灣人認同的不同階段與選擇。¹⁶ 最後，從臺灣與日本的法制出發，探討在時代轉換中的「前殖民地人民臺灣人」，在戰後日本被賦予的法律地位、如何在國際政治下形成「永住權」制度，並以蔡朝忻的經歷為中心，說明歸化日本籍臺灣人的政治主張與活動，所遭遇國共兩黨的壓力，以及返回臺灣的曲折歷程。¹⁷ 綜合以上研究，本書可謂在「華僑研究」之外開展出海外臺灣人社群的研究。另外，雖屬於日本學界的成果，井上弘樹關於臺灣大學日本人留用政策的研究，具有從殖民地史轉為海外日本人史的意義，也涉及戰後初期日華與日台關係的演變。井上氏同時發現，在日人留用政策上，臺大首任校長羅宗洛著重作為中華民國教育機關的大學角色，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則重視臺灣人研究者的養成。¹⁸

海外臺灣人活動的焦點之一，還有臺獨運動的研究。藉由對「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的文本解讀與口述訪談成果，彭琳沁分析許世楷有關國族的想像與其他各種臺獨理念的異同，指出「四大文化集團」（族群）的概念成為日後臺灣政治的主流價值。¹⁹ 彭氏也針對史明的「臺灣民族」論，梳理各種理論與說法所產生的影響。²⁰ 許

¹² 曾獻緯，〈戰後初期臺灣的糧食管制(1945-1949)〉，《臺灣文獻》，66:3(2015.9)，頁53-102。

¹³ 何義麟，〈澀谷事件報導之傳播過程及其影響〉，《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臺北：五南，2015)，頁18-46。

¹⁴ 何義麟，〈在日臺灣人與華僑新聞事業之發展〉，《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頁47-76。

¹⁵ 何義麟，〈臺灣留日學生的左傾化言論及其動向〉，《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頁78-122。

¹⁶ 何義麟，〈在日臺灣人二二八事件論述之演變〉，《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頁123-162。

¹⁷ 何義麟，〈在日臺灣人法律地位與永住權問題〉、〈歸化日本籍臺灣人的返鄉之路〉，《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處境與認同》，頁164-188、189-216

¹⁸ 井上弘樹，〈国立台湾大学における日本人留用政策〉，《日本台湾学報》，16(2014.6)，頁84-106。

¹⁹ 彭琳沁，〈臺灣獨立運動之國族想像—以許世楷擬《臺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為中心〉，《臺灣史學雜誌》，18(2015.6)，頁63-105。

世楷與史明皆於日本從事運動，若從何義麟的研究脈絡來思考，或許也提示臺獨理念在臺灣人社群、日本華僑社群，以及戰後日本社會中的位置，是未來可以再進一步推展的議題。

三、地方政治運作

臺灣省議會從 2004 年開始與中研院臺史所合作，將該會的檔案、公報、議事錄及議員問政錄影帶加以數位化，建置「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並編寫《臺灣省議會會史》。²¹ 此批豐富的史料，加上相關的研究計畫，使得近年關於臺灣省議會的研究數量頗豐。王靜儀利用史料總庫，綜觀性地梳理戰後省議會（含省參議會與臨時省議會）不同階段的職權變化，且有別於過去的省議會分期標準，以省主席的性質為準，分為省政府軍人省主席、文人省主席與省長時期。王氏佐以簡明的重要提案，說明省議會職權逐漸提升以及與臺灣政治結構變化的相互關係。²² 吳俊瑩也以此資料庫為基礎，從省議員對「違警罰法」的批評，說明臺灣人民對該法並非不以為意，而是從日治時期的經驗以及憲法本文的精神作為論述基礎，在憲政與人權保障的要求上展現歷史經驗的延續。²³ 歐素瑛同樣利用省議會史料總庫，佐以「行政長官公署檔案」與「省級機關檔案」，從歷次的質詢、發言與提案，梳理省參議員在日產糾紛調處的角色。她指出省參議員接受人民陳情，但在職權與當時情勢下，大多心有餘而力不足。²⁴ 徐暄景則聚焦於李萬居在省議會中的問政情形。²⁵

有意思的是，關於土地改革的研究中，亦有研究指出（臨時）省議會的「建議案」相當程度地形成政治壓力，使得戰後臺灣土改成為「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廖彥豪與瞿宛文的系列研究著眼於「耕者有其田條例」，追索在該條例立法過程中，過去被視為在二二八事件後已削弱的臺籍地主階層，透過串連各縣市議會向中央發聲，而其建議案對最後擇定有相當的影響。此研究認為，過去將戰後臺灣定位為「強國家一弱社會」的說法，以及「中央—地方二重侍從主義」之論述，在土地改革的案例中應當被修正。²⁶ 土地改革的系列研究可能被歸於經濟史，但上文嘗試推翻或修正戰後政治史的整體性解釋架構，並由相關史料著手，意味著歷史學與社會科學在戰後政治史上有更多的交集與對話。例如運用「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與「省級機關檔案」的學者，以及熟悉國民黨內部檔案的學者，若能參與此系列討論，在許

²⁰ 彭琳淞，〈史明臺灣民族論的理論內容與民族內涵〉，《臺灣史料研究》，45(2015.6)，頁18-67。

²¹ 李巧雯，〈論《臺灣省議會會史》〉，《臺灣文獻》，65:1(2014.3)，頁13。

²² 王靜儀，〈臺灣省議會職權演變分析(1946-1998)〉，《弘光學報》，74(2014.12)，頁51。另著有《臺灣省議會議員小傳及前傳》(臺中：臺灣省諮議會，2014)。

²³ 吳俊瑩，〈戰後臺灣關於「違警罰法」的批判內容與脈絡考察〉，《臺灣文獻》，66:3(2015.9)，頁151-196。

²⁴ 歐素瑛，〈臺灣省參議會對日產糾紛之調處〉，《臺灣學研究》，18(2015.15)，頁99-150。

²⁵ 徐暄景，〈臺灣省議會黨外精英與民主政治發展〉(臺北：花木蘭文化，2014)。

²⁶ 廖彥豪、瞿宛文，〈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臺灣實施耕者有其田的歷史過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8(2015.3)，頁69-145。

多關鍵的細節上，或可有更多元的觀察。²⁷

回到地方民意機構的研究，吳沁昱聚焦戰後初期的新竹市參議會，由更基層的民意機關，說明地方政治勢力的組成與消長。吳氏說明幾個從新竹觀察的現象：戰後調整的行政區劃提供日治時期政治菁英水平流動的機會，且由於二二八事件安然渡過者為數不少，使得新竹參議員流動率低。²⁸ 同樣是民意代表的研究，賴信真鎖定戰後臺灣第一屆女性中央民意代表，反駁女性參政動機的一元化論述，指出包括參與公共事務、家世與學歷背景、人際網絡與強烈的參政意圖，才是這些女性當選的主因。賴氏並未涉及這些女性的政治活動與言論，且婦女組織的動員系統及她們在第一屆中央民代中所扮演的角度，為未盡的議題。²⁹ 盧文婷則以嘉義許家班與雲林蘇家班為例，比較兩個女性為主的政治家族，與地方政治勢力、政黨和個人特質的關係。³⁰

與基層政治運作密切相關的組織為農會。黃仁姿從戰後農會與合作社的合併或分立，說明背後除了日本和中國兩套制度轉換的問題，還涉及掌握國民黨社會部的CC派與擔任臺灣省主席及行政院長的陳誠，兩方對合作事業的控制權之爭。本文顯示戰後臺灣基層（政治）組織的接收與改組頗為複雜，新執政者內部的派系影響制度的推動方向與時程，而最高領袖最後的拍板定案，也可視為領袖意志的貫徹和戰後黨國體制的特色。³¹

四、白色恐怖與治安體制

這兩年間有關白色恐怖的研究成果不少，更加細膩且有新的嘗試。李禎祥利用國家檔案管理局檔案與口述訪談資料，從眾多案主與家屬的經驗出發，探討白色恐怖「複合式人權侵害」的性質。³² 李氏的另一篇研究聚焦「知匪不報」罪，也從大量的案例出發，分析該罪的時代背景與歷史脈絡、人際關係應用特色，以及相關法令的比較。³³ 兩篇研究有助於從實際經驗過程理解白色恐怖。黃龍興運用省保安司令部檔案，從《公論報》發行人李萬居及該報記者的遭遇，說明白色恐怖時期言論遭受打壓的具體案例。³⁴ 陳中禹也是利用省保安司令部，挖掘原住民政治案件「湯

²⁷ 系列討論可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98期與第100期。

²⁸ 吳沁昱，〈戰後初期新竹政治的活動——以新竹市參議會為中心(1946-1950)〉，《竹塹文獻雜誌》，58(2014.12)，頁144-161。

²⁹ 賴信真，〈戰後臺灣第一屆女性中央民意代表初探〉，《臺灣風物》，64:1(2014.3)，頁49-84。

³⁰ 盧文婷，〈雲嘉地區地方政治家族的形塑比較：以許家班與蘇家班為例〉，《嘉義研究》，12(2015.9)，頁161-226。

³¹ 黃仁姿，〈農會的檔案與歷史——以戰後農會與合作社分合的派系紛爭為例〉，《檔案季刊》，13:1(2014.3)，頁60-73。

³² 李禎祥，〈白色恐怖下的家庭悲劇：複合式人權侵害案件之考察(1949-1992)〉，《臺灣風物》，65:1(2015.3)，頁71-117。

³³ 李禎祥，〈在無罪中定罪——戰後臺灣「知匪不報」案件之研究〉，《臺灣史料研究》，45(2015.6)，頁68-113。

³⁴ 黃龍興，〈黨國威權體制下的另類媒體：《公論報》在白色恐怖時代的對抗與噤聲〉，《臺灣風物》，

守仁叛亂案」過去未公開的卷宗，考察情治機關發展案件的細密過程。從這些卷宗發現了過去此案件較不被提及的細節，例如原住民內部鬥爭、當地族群形勢與情報單位發展案情的心態。³⁵ 顧恒湛的研究雖難以直接歸類白色恐怖，但戰後初期臺灣山地治安體制的建立，又與白色恐怖有部分關係。顧氏將國民黨政權滲透至臺灣山地分為三個階段，分別說明各期國民黨政府的統治方式，認為國民黨政府是透過空間分隔、組織管制、層級調查與監察，用傅柯「全景敞視主義」的角度將原住民置於國家權力之眼下。³⁶ 楊秀菁從雷震手稿保存的《向毒素思想總攻擊》與《「自由中國」半月刊違法言論摘要》著手，分析黨政高層在決定雷震罪名與刑度時，意識到以言論入罪可能引發爭議，以及領袖蔣介石親自修改判決書，對雷震及《自由中國》的言論進行批判。³⁷ 金恒煒則從吳國楨、胡適與殷海光的往來信函，說明白色恐怖的例證，以及胡適與殷海光面對臺灣何去何從的不同想像。³⁸

有別於上述取徑，數位研究者嘗試從不同角度研究白色恐怖。林傳凱檢視白色恐怖口述史與回憶錄的「多版本」問題，解析「大眾史學」的形成結構，並認為除了寫史與讀史權力的普及，當事者的「言述空間」也深受結構條件影響。作為具有解構意味的本文，最後認為忠實地「呈現事實」不見得是大眾訴說的必然選擇，也對此提出辨別真偽的方法。³⁹ 鄧宗德以「萬新鐵路」為主軸，從地景說明沿線各站與白色恐怖歷史的淵源，並從鐵路位於臺北盆地邊緣，與白色恐怖的相關設施從市中心往城市邊緣遷移的歷史相互參照，使得本文具有將白色恐怖與城市發展和記憶相互連結的意義。⁴⁰ 蘇瑞鏘則分析當時仍是總統的馬英九，對於臺灣白色恐怖的認知與反省，認為由「雙戰結構」（冷戰+內戰）所認知的白色恐怖導致馬英九只偏重狹義的「紅色政治犯」，卻對臺獨政治犯視而不見；在反省白色恐怖時一方面哀悼受害者，另一方面卻歌頌加害者，批評戒嚴卻也肯定戒嚴等等矛盾作為。⁴¹ 在具有建構意味的白色恐怖史料和研究累積越多時，上述具有後設或外延白色恐怖研究的嘗試是否也會增加，是日後可觀察之處。

其他較難被歸於上述類別的有下列文章。楊瑞松從「大陸」一詞於臺灣的不同內涵，說明作為鄉愁/故土與匪區/鐵幕的矛盾綜合體，「大陸」為中華民國政府來臺

65:1(2015.3)，頁119-155。

³⁵ 陳中禹，〈從檔案看原住民政治受難個案：以「湯守仁叛亂案檔案」為中心〉，《檔案季刊》，14:1(2015.3)，頁45-66。

³⁶ 顧恒湛，〈隔離、監視與滲透——戰後初期臺灣山地治安體制建構之歷史考察(1945-1952)〉，《臺灣史學雜誌》，17(2014.12)，頁73-103。

³⁷ 楊秀菁，〈權衡下的10年罪責：雷震案與1950年代的言論自由問題〉，《國史館館刊》，40(2014.6)，頁103-138。

³⁸ 金恒煒，〈胡適：自由主義者還是蔣政權的捍衛者？從吳國楨事件看殷海光與胡適沒有出鞘的交鋒〉，《文史臺灣學報》，9(2015.6)，頁193-256。

³⁹ 林傳凱，〈「大眾傷痕」的「實」與「幻」——探索「1950年代白色恐怖『見證』」的版本歧異〉，《歷史臺灣》，8(2014.11)，頁35-81。

⁴⁰ 鄧宗德，〈臺灣白色恐怖的記憶保存之道——以萬新鐵路歷史軌跡為例探索白色恐怖事件與臺北盆地邊緣之關聯性〉，《臺北文獻》，194(2015.12)，頁93-137。

⁴¹ 蘇瑞鏘，〈論馬英九對戰後臺灣白色恐怖的認知與反省〉，《臺灣風物》，65:2(2015.6)，頁131-168。

後想像共同體的極致表現，長期影響臺灣住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解。⁴² 汪宏倫以「戰爭之框」(frames of war)的概念，說明對國族建構的影響，以此解釋何以臺灣也如東亞其他國家一樣，對於歷史問題的認識有諸多爭議。⁴³ 雖不是相同脈絡，但管美容對臺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所作的調查，則呈現歷史評價多元的情形，學生的反應未必如教科書所設定，但也指出抗日戰爭的多面性與對人類的價值，正是從事歷史教育的好教材。⁴⁴ 黃雯娟研究臺南市的街路命名，荷蘭與鄭氏進行主導式的命名，清代隨著商業發達出現行業名稱的街名，後期則逐漸以人文地景為命名原則。日治依方位命名町區，戰後移除日本色彩後，未如其他城市賦與街路中國地名，而以臺南本地特色做為命名原則。⁴⁵ 陳君愷梳理「國家主權」與「國民主權」在歐洲發展的歷程，說明在民主化風潮下，主權的確立，從外部的國家承認轉向內部的國民意志，但兩者相互影響，無法完全區隔。戰後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逐漸流失，但在民主化過程推動下國民主權則長足發展，不過，馬英九執政時期國家主權的授權基礎轉移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文末指出，落實國民主權對於確立國家主權而言，有重要而關鍵的意義。⁴⁶

五、日本學界概況

日本《史學雜誌》每年五月號對日本歷史學界前一年的成果分門別類介紹，以下將〈臺灣〉類作為基礎，並補充文獻類目的文章。2015年〈臺灣〉項下的政治史方面，日治時期的研究為數較多，集中於日本殖民統治與國家認同等問題，戰後則多集中於外交史（日華/日台、美國外交政策），包括吹戶真實解明美國政府在1955年對中國與臺灣政策的變化，以及鹿錫俊說明蔣介石對日本人教官的評價與運用。馬場公彥《現代日本人的中國像：從日中關係正常化到天安門事件與天皇訪中》一書，雖然重點放在文革結束前夕到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日本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感（1973-1992），但專章處理戰後日本人眼中的臺灣形象，考察國民黨政府對日宣傳工作。書末並訪談若林正丈、西村成雄、濱下武志、船橋洋一與毛里和子，呈現戰後第二代研究者（船橋為記者除外）的生命經歷與學術養成，如何影響對臺灣與中國的印象。⁴⁷

⁴² 楊瑞松，〈曖昧的他者：「大陸」在臺灣〉，《臺灣史學雜誌》，19(2015.12)，頁105-124。

⁴³ 汪宏倫，〈臺灣的「歷史認識問題」初探：史觀、戰爭、框架〉，《21世紀東アジア社会学》，6(2014.3)，頁72-94。

⁴⁴ 管美容，〈臺灣高中生眼中的抗日戰爭：高中生問卷調查結果之分析〉，《臺灣文獻》，66:3(2015.9)，頁197-231。

⁴⁵ 黃雯娟，〈命名的規範：臺南市街路命名的文化政治〉，《臺灣史研究》，21:4(2014.12)，頁147-186。

⁴⁶ 陳君愷，〈臺灣民主化過程中「國家/政府」的權力來源及其轉移——以「主權」及統治正當性基礎為中心的分析〉，《臺灣史學雜誌》，19(2015.12)，頁70-104。

⁴⁷ 吹戶真實，〈一九五五年の台湾海峡とアメリカ：アイゼンハワー政権の「分断固定化」政策の展開に着目して〉，《アメリカ史評論》，31(2014.3)，頁1-31；鹿錫俊，〈蔣介石日記に見る在台湾日本人軍事教官の諸相〉，收入：齊藤道彦(編)，《中国への多角的アプローチ III》(八王子：中央大学出版部，2014)；

另外，延續「臺灣範圍的國民國家」概念，若林正文以 2013 年世界棒球經典賽的場景為例，舉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喊著「臺灣加油」的口號，凸顯出「臺灣」與「中華民國」（但隊名為「中華臺北」）的複雜關係。由此出發，討論作為國民國家的晚近性、不被主要國家承認的例外性，以及因此而展現的特殊國家性。⁴⁸ 由他所編輯的《解讀現代臺灣政治》也在此框架下，從內政到外交討論「國家性」的各個面向，小笠原欣幸以詳盡的現地考察為基礎，從雲林縣說明臺灣地方選舉的運作以及派系逐漸弱化的現象。⁴⁹ 比較政治學者岸川毅從政黨體系（party system）理論出發，認為臺灣 1950 年代以來呈現「臺灣範圍」民意的（臨時）省議員，在 1970 年代後轉向增額中央民代選舉，以及青年黨和民社黨提供了部分臺籍菁英政治舞臺，特別是與他國的「衛星政黨」相較，青年黨與民社黨在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為吃重，值得注意。⁵⁰ 松本充豐從政治組織出發，提示臺灣研究的未盡課題，包括半總統制的比較（總統與總理/行政院政的關係）、2000 年政黨輪替後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系統性研究、兩黨黨內派系研究、新興民主國家比較研究中的臺灣特殊性、總統化的政黨以及半總統制與選舉等問題，挖掘臺灣研究的定位。⁵¹ 清水麗、前田直樹與松田康博等人則從臺日、臺美及臺中關係出發，說明作為主權國家的「臺灣」所面臨的國際處境。⁵² 該書是由早稻田大學臺灣研究所主辦的「臺灣政治外交研究的現在」系列工作坊的報告所集結，除了講者內容外，也收錄每場的問答發言記錄。問答過程顯示日本學者對於戰後臺灣政治學或政治史研究的觀察，意識到臺灣現行學術作品產出制度與研究議題取向的關聯，並展現對政治學理論、比較研究、田野調查和臺灣史料的高度掌握。

與上述研究領域略有不同，篠原清照從教育運動出發，說明臺灣在民主化後所進行的教育運動，在各種價值上的衝突，皆使不同運動團體以及內部發生路線上的爭議。篠原氏認為，教育運動最終與自由化和民主化之間選擇何種價值有關。⁵³ 赤江達也以高雄市忠烈祠為例，指出忠烈祠從原本祭祀為國犧牲的官兵，在 1998 年後轉為殉難的公務人員及人民，但在關於二二八事件殉難者入祀問題上，卻引發「中央—臺北—國民革命忠烈祠」的想像。⁵⁴ 若松大祐指出泰緬孤軍的形象，在 1980 年代成為共產主義受害者的難民同胞，1990 年代後由於臺灣意識的加強，成為在泰北

馬場公彥，《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日中国交正常化から天安門事件・天皇訪中まで》（東京：新曜社，2014）。

⁴⁸ 若林正文，〈現代台湾の「中華民國」—例外国民国家の形成と国家性〉，《東洋文化》，94(2014.3)，頁9-27。

⁴⁹ 小笠原欣幸，〈台湾の選挙を地方から読み解く—雲林県の事例〉，收入：若林正文（編），《現代台湾政治を読み解く》（東京：研文出版，2014），頁23-63。

⁵⁰ 岸川毅，〈政党システム変動の研究から読み解く〉，頁64-105。

⁵¹ 松本充豐，〈政党組織研究から読み解く〉，頁106-142。

⁵² 清水麗，〈日台関係史研究から読み解く〉，頁143-176；前田直樹，〈戦後米台関係史研究から読み解く〉，頁177-209；松田康博，〈中台関係の国際政治学から読み解く〉，頁210-247。

⁵³ 篠原清照，〈台湾における教育運動と民主化〉，《岐阜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 人文学科》，62:2(2014.3)，頁 271-289。

⁵⁴ 赤江達也，〈現代台湾における「烈士」の変容—高雄市忠烈祠の事例から〉，《社会システム研究》，28(2014.3)，頁43-60。

待支援的難民華僑，映照出臺灣對於自身認同的轉變。⁵⁵

2016年《史學雜誌》的〈臺灣〉項下將「國民黨政治及其變動」獨立列為一小類，以下再分三個研究領域。首先是媒體研究，貴志俊彥、川島真與孫安石所編的《戰爭・收音機・記憶》收錄江柏煒、林美華所著文章，梳理冷戰時期金門對中國廣播心戰的歷史，而林果顯則從1950年代的廣播節目內容，說明反共意識型態如何透過軟性的方式滲透至一般人的日常生活。⁵⁶其次是外交史範圍，佐橋亮以「信賴性與安定均衡的追求」架構，說明1948年至1979年美國的中國政策與臺灣的國際地位，程蘊則以日本外交史的視角，討論1963年至1964年的日華關係。Yamada, Atsushi從琉球對日本外務省陳情等事例，分析超越兩國關係的其他因素如何影響日臺關係。⁵⁷第三個領域是臺灣民主化過程，從當代研究漸漸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高井由紀探索長老教會在1960至70年代初與親國民黨的「國語教會」漸行漸遠的過程，若林正文運用口述訪談等方式，考察1970年前後康寧祥的「身體」如何促成黨外人士的團結感，森田健嗣則聚焦1980年代臺灣省議會擴大台語空間的主張。⁵⁸兩年回顧的作者指出，近年臺灣社會的各種的變化，對於日本學界看待臺灣的眼光，以及研究者所抱持的問題意識可能會帶來影響，另外，如何將臺灣經驗從更寬廣的歷史定位視角加以研究，今後應該會更受到重視。⁵⁹

從這兩年的研究回顧來看，日本學界關於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從日本自身的關懷出發，關切國際政治角力中的臺灣處境，以及相互之間的影響，同時「中國」因素常在視野之內。而在內政治理上，媒體研究、民主化過程、地方選舉和政黨為研究主軸。日本學界在史料、現地考察與理論的掌握，以及對研究視野反省，展現豐沛的能量，但學科分際的不同或許也使得與臺灣學界的交流上，產生一定的隔閡。

六、美國學界概況

⁵⁵ 若松大祐，〈現代台湾史における泰緬孤軍イメージ—本土化の不徹底を示す一つ事例〉，《社会システム研究》，29(2014.9)，頁59-94。若松氏另有一文介紹蔣介石《蘇俄在中國》的歷史觀。若松大祐，〈蔣介石『中国の中のソ連』(1957)の歴史観—台湾から米華相互防衛条約を基礎づける〉，《現代台湾研究》，44(2014.3)，頁1-22。

⁵⁶ 林果顯，〈台湾における日常生活のなかの「反共知識」構築〉；江柏煒、林美華，〈軍事最前線金門島からの呼び声〉，收入：貴志俊彥、川島真、孫安石(編)，《戦争・ラジオ・記憶》(東京：勉誠出版，2015)，頁316-333；334-371。

⁵⁷ 佐橋亮，〈共存の模索：アメリカと「二つの中国」の冷戦史〉(東京：勁草書房，2015)；程蘊，〈日華紛争における政治力学：外務省、親台湾派及び国府(1963~1964)〉，《法政大学大学院紀要》，74(2015)，頁83-99；やまだあつし，〈1950年代日台政経関係にアジアや琉球はどう影響したか〉，《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260(2015.2)，頁57-73。

⁵⁸ 高井ヘラー由紀，〈戦後台湾キリスト教界における超党派運動の展開と頓挫：分水嶺としての「国是声明」と歴史観の相剋〉，《キリスト教史学》，69(2015.7)，頁74-110；若林正文，〈康寧祥と「党外」の黎明：台湾オポジション第2次組党運動前夜〉，《日本台湾学会報》，17(2015.9)，頁128-143；森田健嗣，〈戦後台湾のオポジションによる言語権の主張：議会の議論に注目し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90(2015.9)，頁61-78。

⁵⁹ 深申徹，〈台湾〉，《史学雑誌》，124:5(2015.5)，頁245-247；家永真幸，〈台湾〉，《史学雑誌》，125:5(2016.5)，頁250-252。

戰後臺灣政治史的英文著作，其作者許多來自臺灣，不過，收錄於美國的英文期刊或以英文專書發表，也顯示這些議題符合美國學界對臺灣的關心。從數量上來看，認同政治與文化政治、民主化過程、政策形成與國防政策為這兩年研究成果較豐富的領域。

在認同政治方面，王甫昌從福佬、河洛、閩南、Holo等名詞的辯論與演變，說明臺灣福佬認同的處境。王氏認為福佬認同中對自我的指稱一直受到不同時期的外在環境所影響，因而此認同具有勉強而不太情願的面向。⁶⁰ 陳若蘭運用隨機係數模型（random coefficient model）分析 1992、1996、2000 與 2004 年臺灣人的臺灣認同，區分族群、政黨、世代與教育程度，意圖分析其背後的心理與結構性機制，並且探討臺灣人如何面對一方面民主化過程中上升的臺灣意識，但另一方面又因與中國日益緊密的經濟利益，而阻止了激進的臺灣意識。⁶¹ 黃義杰以 2004 年總統大選前「二二八牽手護臺灣」活動為例，探討如何創造一個創傷事件的集體記憶，以及此記憶如何導致臺灣國族認同的產生。⁶² 馬寶康（Malte Philipp Kaeding）則將「中國化」與「香港化」予以概念化，說明臺灣的社會運動如何意識到香港的處境與抗爭經驗，並在草根層上與香港合作，抵抗中國。⁶³

在文化政治方面，王莉雯以 1950 年代著名的反共戲劇「大巴山之戀」為例，說明反共意識與懷鄉情緒如何相互結合，以及反共懷鄉如何鞏固臺灣內部不同族群的國族認同。⁶⁴ Yu-ting Huang 也提到戲劇「寶島一村」的懷鄉情緒，該劇以幽默的方式訴說近代中國的流亡經驗、族群視野與認同危機，雖然淡化複雜的族群衝突，卻意圖以歡笑的方式將特殊的眷村經驗轉化為臺灣社會的集體記憶。⁶⁵ 這兩篇文章均涉及反共戰爭及塑造不同族群共同記憶的工作，與前述汪宏倫提出「戰爭之框」成為分化歷史記憶的作用，或可互相對照。王俐容簡述臺灣從 1949 年之後至現時的國家認同與文化政策，並指出，文化政策深受國家認同影響，但在外來移民與中國經濟影響下，政府很難制定同質性的族群文化與認同，文化政策與國家認同的關係將變得更加複雜。⁶⁶

有兩篇文章涉及政治與學術研究的關係。歐蒂娜（Hardina Ohlendorf）分析中國

⁶⁰ Fu-Chang Wang (王甫昌), "A Reluctant Identity: The Development of Holo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5(2014.7), pp. 79-119.

⁶¹ Rou-Lan Chen (陳若蘭), "Reconstructed nationalism in Taiwan: A Politicized and Economically Driven Identity,"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3(2014.7), pp. 523-545.

⁶² Yih-Jye Hwang (黃義杰), "The 2004 Hand-in-Hand Rally in Taiwan: "Traumatic" Memory, Commemorat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20:3(2014.7), pp. 287-308.

⁶³ Malte Philipp Kaeding (馬寶康), "Challenging Hongkongisation: The role of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and Perceptions of Post-handover Hong Kong," *Taiwa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5(2014.7), pp. 120-133.

⁶⁴ Li-wen(JOY) Wang (王莉雯), "Beyond Political Propaganda: Performing Anticommunist Nostalgia in 1950s' Taiwan," *Theatre History Studies*, 33(2014.1), pp. 193-208.

⁶⁵ Phyllis Yu-ting Huang, "Representing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From Tragic Narratives to the Comedic Play Baodao yi cun [The Village]," *Archiv Orientalní*, 82:1(2014.2), pp. 141-162.

⁶⁶ Li-jung Wang (王俐容), "Cultural Differen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Policy in Taiwan," in Hye-Kyung Lee and Lorraine Lim (eds), *Cultural Policies in East Asia: Dynamics between the State,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p. 35-52.

的臺灣研究所面臨的兩難，認為若將臺灣研究視為自成一格的研究領域，將間接地挑戰中國再統一的理由，相對地，若強調臺灣與中國的共通性，則證明臺灣具有改變中國的顛覆性角色。特別是當臺灣研究的成果越豐碩時，臺灣在經濟發展典範、民主理論與認同政治領域更被視為獨特的案例，成為有自己定位的社會科學，而非漢學或中國研究的分支。⁶⁷ 劉曉鵬將焦點放在 1975 年改隸為政治大學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梳理其前身成立於中日戰爭時期的「國際問題研究所」，說明兩者皆在戰爭與國家危難期間，召集學者成立智庫，提供決策者研判形勢，並在政治任務褪去後，轉向學術領域發揮影響力。⁶⁸

民主化過程是戰後臺灣史的一大重點。吳重禮與戴士展探討何以國民黨能有別於大部分第三波民主國家，在轉型為民主體制的過程中，繼續在中央與地方長期保持執政優勢？該文指出國民黨透過調整意識型態、黨員結構、菁英組成，以及對反對力量的因應作為，使國民黨成功從一個外省政黨轉為本土政黨。不過作者也指出，若國民黨不加速自身改革、未能更民主化，也可能在民主選舉中失利。⁶⁹ 任雪麗的研究呼應上述歐蒂娜的說法，亦即若中國與臺灣共同承續相同的儒家傳統，也可能發展成相同的未來，臺灣成為中國民主化的重要參考。⁷⁰ 曹立群、黃蘭嫻和孫懿賢則由法制、觀念養成和新時代的挑戰，討論臺灣的「治安」議題從威權到民主化時期的演變。⁷¹ Erik Moberand 比較韓國與臺灣的民主化經驗，分疏兩者共同的歷史條件與不同結構，強調地方政治在兩者民主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⁷² 李允卿則比較威權體制下韓國與臺灣的政黨形式和社會運動的關係，臺灣因有強力的政黨組織而使社會運動常需依靠政黨力量，而韓國的個人獨裁有礙政黨發展，但卻易產生較積極的運動部門。⁷³ 池恩周則從行動者理性選擇的模型出發，說明國民黨與民進黨雖然對選舉制度的改革方式與時程不同，但在擴大立法院席次的考量下，共同推動選制的改革。⁷⁴

⁶⁷ Hardina Ohlendorf (歐蒂娜), "The Taiwan Dilemma in Chinese Nationalism: Taiwan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ian Survey*, 54:3(2014.5), pp. 471-491.

⁶⁸ Philip Hsiaopong Liu (劉曉鵬), "Gathering Scholars to Defend the Countr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fore 1975," *Issues & Studies*, 50:1(2014.3), pp. 55-88.

⁶⁹ Chung-li (吳重禮) and Shih-chan Dai (戴士展), "From Regime Transition to Liberal Democracy: The Case of Taiwan," in Edmund S.K. Fung and Steven Drakeley (eds), *Democracy in Eastern Asia: Issue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a Region of Diversity* (N.Y.: Routledge, 2014), pp. 60-79.

⁷⁰ Shelley Rigger (任雪麗),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Mainland China's Future," in Kate Xiao Zhou, Shelley Rigger, and Lynn T White III (eds),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Loc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N.Y.: Routledge, 2014), pp. 36-50.

⁷¹ Liqun Cao (曹立群), Lanying Huang (黃蘭嫻), Ivan Y. Sun (孫懿賢), *Policing in Taiwan: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cy* (N.Y.: Routledge, 2014).

⁷² Erik Moberand, "South Korean Democracy in Light of Taiwan," in Kate Xiao Zhou, Shelly Rigger and Lynn T. White III (eds),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Local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19-35.

⁷³ Yoonkyung Lee (李允卿), "Diverging Patterns of 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 in Korea and Taiwan: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sian Survey*, 54:3(2014.5), pp. 419-444. 另有專書細密比較臺韓民主化中的政治文化、政黨組織、媒體影響，以及經濟和福利政策。Larry Diamond and Gi-Wook Shin (eds), *New Challenges for Maturing Democracies in Korea and Taiw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⁷⁴ Eunju Chi (池恩周), "Two-party Cont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Reforms: The Case of Taiwa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49:4(2014.10), pp. 658-681.

羅致政說明必須理解內政議題、個人特質與領導機制，才能解釋臺灣在強人統治後的政治局面與政黨輪替。⁷⁵

政策形成為政治學的重要議題，以下針對四個重要政策或法律的形成過程討論臺灣的民主機制。陳敦源與黃文彥以社會政策立法討論選舉和政策形成的關係，⁷⁶ 高永光以「大碧潭再造計畫」討論市民參與和政策形成的關係，⁷⁷ 魯炳炎以蘇花高速公路為例討論政策形成中的媒體力量，⁷⁸ 蘇偉業從行政中立法法案，討論官僚在立法過程中的角色。⁷⁹ 上述討論對於民主化後臺灣的議會民主運作實態與問題，提出觀察。在國防政策上，Eric Setzekorn注意到拉法葉艦弊案強化文人總統對國防事務的控制，但臺灣目前包括停止徵兵等國防改革，卻又缺少政治與公共利益。⁸⁰ Andrew T. H. Tan則指出臺灣持續滑落的國防能力，將減低與中國的博弈能力，並無力應付突發狀況以及與中國之間的終極處理能力。⁸¹

英文著作中從政治學、公共行政與社會學理論發想的比例甚高，研究的期限也多晚近，並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隨著時間流逝，這些研究成果與臺灣史學界的關係將更為密切，如何增進彼此對話的基礎應屬重要。另外，所回顧的英文著作有許多作者出身臺灣，這一方面顯示臺灣學者努力將臺灣作為與既有理論或模型對話的案例，在國際學界發聲，另一方面也表示目前臺灣人以外的國際學者，對於戰後臺灣史的關心，仍有拓展空間。

七、小結

綜合上述，2014年與2015年內政治理的戰後臺灣史研究，在具體議題上偏重政

⁷⁵ Chih-Cheng Lo (羅致政),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fter the Strongmen: Leadership matters," in Hsin-hung Michael Hsiao (ed), *Democracy for Alternative Political Systems in Asia: After the Strongmen* (N.Y.: Routledge, 2014), pp. 43-57.

⁷⁶ Don-yun Chen (陳敦源) and Wun-yun Huang (黃文彥), "Understanding Democratization through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Congressional Policy-making: The Case of the 'Golden Decade' of Social Policy Legislation in Taiwan," in Bennis Wai Yip So and Yuang-kaung Kao (eds), *The Changing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Greater China: Case Research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N.Y.: Routledge, 2014), pp. 78-96.

⁷⁷ Yuang-kuang Kao (高永光),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cy-making in Taiwan: The Case of the Great Bitan Revitalization Project," in Bennis Wai Yip So and Yuang-kaung Kao (eds), *The Changing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Greater China: Case Research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pp. 17-36.

⁷⁸ Wilbur Bing-yan Lu (魯炳炎), "The Media Power of Manufacturing Policies: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of the Su Hua Highway in Taiwan," in Bennis Wai Yip So and Yuang-kaung Kao (eds), *The Changing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Greater China: Case Research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pp. 137-154.

⁷⁹ Bennis Wai Yip So (蘇偉業), "How Far Does Bureaucracy Control the Agenda of Government Personnel Administrative Policy in Taiwan? The Case of Law-making for Civil Service Neutrality," in Bennis Wai Yip So and Yuang-kaung Kao (eds), *The Changing Policy-making Process in Greater China: Case Research from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Hong Kong*, pp. 190-207.

⁸⁰ Eric Setzekorn, "Military Reform in Taiwan: The Lafayette Scandal, National Defense Law and All-Volunteer Force,"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1:1(2014.4), pp. 7-19.

⁸¹ Andrew T. H. Tan, "The Implications of Taiwan's Declining Defense," *Asia-Pacific Review*, 21:1(2014.5), pp. 41-62.

權轉換時期官方與臺灣社會的互動、政府內部與美國因素的介入，以及海外臺灣人的處境。受惠於資料庫的建置，省議會和地方政治運作的研究增加，另外，白色恐怖的成果亦相當豐碩。日本學界關於戰後臺灣政治史的研究，從日本自身的關懷出發，關切國際政治角力中的臺灣處境，媒體研究、民主化過程、地方選舉和政黨研究為內政治理的重要主題。美國學界的作者相對多元，議題偏重國家認同、民主化、政策形成與國防政策。

除此之外，針對此兩年的成果有以下三點觀察。首先，內政治理中的外國因素在諸多研究中被重視，不論是美國、日本或中國在歷史過程中的身影，益見鮮明。在史料開放的預期下，具有跨域意義的內政研究可能更多，與外交史或國際關係史之間的對話，或許可以期待有更多研究出現。其次，是新議題的開發。政權轉換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土地改革在政治史上的意義，也吸引不同學門的投入，換言之，戰後初期政權變動與政府體制重建的歷史，在新史料與新觀點的影響下受到重視。最後，從所援引的史料可以看出對資料庫與重要史料的倚重。省議會史料總庫、日記資料庫、國史館的兩蔣資料，以及臺灣文獻館的省級機關檔案、行政長官公署檔案，檔案管理局收錄的資料，或是林獻堂、蔣介石日記與口述訪談記錄，幾乎散見於各研究。這一來值得欣喜，二來也顯示新史料繼續開拓的需求。某些議題若欲進一步深化，有賴於更基層的政府機關、民間組織與個人的資料，或是負責決策與執行的中央部會檔案，在保存與運用上更全面的進展。這仍是未盡課題。